

新疆宗教研究資料

第十四輯

巴州巩乃斯乡调查资料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一九八六年十月



一 前言(代调查报告).....	(1)
二 个案访问笔录.....	(11)
访问乌尼尔才其克笔录.....	(11)
访问包来笔录.....	(12)
访问苏来笔录.....	(13)
访问布杰笔录.....	(15)
访问鲁日布洛翁笔录.....	(15)
访问桑格杰笔录.....	(18)
访问桑加拉笔录.....	(20)
访问伊西笔录.....	(21)
访问阿拉笔录.....	(22)
三 专题资料.....	(23)
鲁日布谈卫拉特蒙古历史及宗教.....	(24)
扎木巴老人谈卫拉特蒙古历史及宗教.....	(34)
胡仓库理雅.....	(41)
巴音库理雅.....	(42)
昂嘉恩库理雅.....	(43)
解放前天山南麓土尔扈特部落的五个和雄五十四个苏木.....	(44)
解放初期天山南麓土尔扈特部三十六所库理雅.....	(46)
巴仑台黄庙示意图.....	(49)
巴仑台黄庙概况.....	(49)
十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土尔扈特汗世系表及大事记.....	(50)
十七世纪初至十八世纪中卫拉特汗世系表及大事记.....	(53)
十七世纪初至十八世纪初和硕特汗世系表及大事记.....	(54)
西藏达赖喇嘛世系表.....	(54)
西藏班禅额尔德尼世系表.....	(55)
西藏嘉木样活佛世系表.....	(55)
藏区著名格鲁(黄教)寺院一览表.....	(56)
四 巩乃斯乡调查资料统计.....	(56)
(一)人口部分(表1—表5).....	(57)
(二)婚姻家庭部分(表6—表15).....	(61)
(三)经济生活部分(表16—表24).....	(63)
(四)文教卫生部分(表25—表27).....	(67)
(五)宗教信仰部分(表28—表35).....	(68)

一 前 言

(代调查报告)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二日至九月二十八日,我们佛教研究室的同志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巩乃斯乡进行了为时四十八天的宗教社会学调查。在我们酝酿这项调查之前,一九八二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新疆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组成的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查队,对新疆蒙古族的历史、宗教、风俗习惯等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考查。他们的考查是从纵的方面,即从新疆蒙古族的社会历史方面进行的综合考查,而我们这次的调查,则是从横的方面,即从新疆蒙古族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社会现象,诸如人口繁衍、婚姻家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关系上进行的抽样调查,欲从这些诸种关系中探索出宗教信仰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规律性。

为了搞好这次调查,下去之前,我们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社会学知识准备和组织准备。我们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农村调查〉序言和跋》等有关社会调查的论著,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关于农村、牧区、统战、民族、宗教等工作方针、政策的文件和领导同志的讲话,以提高和端正参加调查同志对实际调查的认识和态度;学习了社会学的有关调查的基本理论知识,初步熟悉了社会学的调查方法;编写了《调查设想和调查要点》,并多次召集参加调查的同志开会,讨论和研究下去调查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应注意的事项。出发前夕,所领导又亲自召集参加调查的同志开会,并提出了具体要求。所有这些思想上、知识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为我们顺利完成这次蒙古族宗教社会学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这次蒙古族宗教社会学调查改变了过去那种单纯开调查会的传统调查方法,采用了科学的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普查法、图表法、统计法、问卷法和个案法。我们这次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巩乃斯乡的一百一十四户牧民(一百二十六个蒙古包。这里的蒙族,一般说来是一个蒙古包为一家,但也有几家是两个或三个蒙古包为一家的)。此外进行了九个个案调查,并访问了该乡的喇嘛教寺庙——昂嘉恩库理雅^①搜集到有关南部土尔扈特蒙古族^②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文字、数字资料约十万字。另外,我们还意外地搜集到土尔扈特蒙古从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返回祖国时所带回来的托忒蒙文《金刚经》和《昂嘉恩喇嘛传》,这是研究土尔扈特蒙古族的历史、宗教的宝贵资料。

巩乃斯乡概况

巩乃斯乡位于巴音布鲁克草原北部天山北坡、巩乃斯河北岸的一条南北走向，长约三千米的牛角形的小山沟里。这个山沟的名字叫阿尔先沟。“阿尔先”为蒙语，翻译成汉语就是多泉的意思。这个山沟的极北处最窄，还不足二十米；南部沟口最宽，约二百五十米左右。阿尔先水自北而南地流经全沟，最后注入巩乃斯河。它四面环山。北面是阿尔先额垦山，翻过此山就是阿尔先水的源头、闻名全疆的阿尔先温泉，水中含有砷、氟、钙等多种化学元素，水温达四十五度，能治风湿症、神经痛、皮肤病等多种疾病，是理想的浴用温泉。南面是伯林乌勒尔山，东面是夏勒哈木尔山，西面为藏登乌鲁山，翻越此山就是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新源县那拉提乡的地界。连接南北疆的两条公路大干线——库（尔勒）伊（宁）公路和库（车）独（山子）公路都经过此地。出阿尔先沟南部沟口上库（尔勒）伊（宁）公路往东走十余公里，就是巩乃斯林场场部。从这里搭乘汽车往东南可到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往西南经库车可抵达喀什，往北经独山子，往东可到乌鲁木齐，往北可到塔城、阿尔泰等地，交通还算便利。因此，这里接触沟外的信息比较快，也比较多。就是这样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沟，年轻姑娘们的交际舞、迪斯科舞跳得还相当不错。

这个山沟山环水绕，气候湿润；周围山上长满云杉和花草，郁郁葱葱，环境优美，是一个良好的天然牧场。沟的最北部，阿尔先水的西岸有三排四五十间木头房子，是牧民们过冬住的，巩乃斯乡政府就设在这里。巩乃斯乡是刚刚成立的一个乡，它原来是阿尔先公社的第一大队。一九八四年冬底，阿尔先公社一分为二，建立了两个乡：巩乃斯乡和乌鲁扎特乌鲁乡。巩乃斯乡下辖两个村：阿尔先村和乌拉斯泰村。全乡共有一百一十四户人家（一百二十六个蒙古包），六百三十八口人，其中男三百二十七人，女三百一十一人。有党员十八名，团员二十名。他们主要放牧马、牛、牛、骆驼、牦牛，尤以马、羊为大宗。现在全乡共有马、牛、羊、骆驼、牦牛等大小牲畜二万零七百一十一头，其中马一千零五十三匹，羊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二只，牛七百四十六头，骆驼四十三峰，牦牛五十七头。

这个乡由于刚刚成立，物质基础比较薄弱；领导机构也不健全，乡里只有一名党委书记，一名乡长和一名副乡长三个领导干部，其他各种办事机构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各项工作也没有全面铺开，特别是政治思想工作更为薄弱，牧民们的精神生活相当贫乏，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位小学教员跟我们说，他来到这里已经三年多了，还没有在本乡看过一次电影。一九八四年，县文艺演出队曾来过一次，但没有演出，转了一会就走了，至于其他文化生活就更谈不上。不过，由于这个乡接近公路，无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经常搭车到县城或者自治州首府库尔勒，思想还是比较开化的。

这个乡的蒙古族牧民属南路土尔扈特部，由昂嘉恩谢比纳尔繁衍发展而来。“谢比”是蒙语，有的译成“沙比”，意思是徒弟、门徒；“纳尔”是复数，“谢比纳尔”就是徒弟们，门徒们的意思，昂嘉恩谢比纳尔就是昂嘉恩喇嘛的徒弟们的意思。它的由来是这样的：我国明朝时候，土尔扈特部蒙古本是西蒙古（又称为瓦剌或卫拉特）的一部（当时瓦剌蒙古有四部：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游牧于新

疆塔尔巴哈台（今塔城）一带。由于不满意于瓦剌蒙古内部为争夺草场、牲畜而经常发生的冲突和斗争，遂于一六三〇年左右，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迁到了当时尚不属于沙皇俄国政府的额济勒河流域，并在这里驻牧下来。后来沙皇俄国侵入了这地区，借口土尔扈特蒙古人触犯了沙皇政府的法律，把大批土尔扈特人抓了起来，判以各种徒刑或死刑。当时土尔扈特部有一位叫昂嘉恩的喇嘛，他把这些判以无期徒刑或死刑的人要出来，组成了一个谢比纳尔，放牧昂嘉恩喇嘛庙的牲畜或做其他杂役。这就是“谢比纳尔”的由来。土尔扈特部迁回祖国前，在额济勒共建立了十个谢比纳尔，如巴克希恩谢比纳尔、宗喀巴谢比纳尔、格格那谢比纳尔等，约有一万多人，组成一个鄂托克。一七七一年，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蒙古返回祖国时，这十个谢比纳尔也跟了回来。由于路上遭到沙皇军队的前阻后追，许多人惨遭杀害，回到祖国后，十个谢比纳尔还不足一千人，昂嘉恩谢比纳尔也就剩下几十人了。最初被安置在喀喇沙尔（焉耆）乌腾比尔，即现在和静县乌拉斯泰农场果尼尔沟北部。在这里没有呆多久，就迁到伊犁草原乌拉斯泰的阿策地方。以后又从这里迁到现在的阿尔先沟地方。

解放以前，阿尔先沟的蒙族牧民受着国民党和封建寺庙经济的奴役和剥削，生活相当贫困，人口发展缓慢。那时阿尔先沟蒙族牧民总共才有五六十顶毡房（即蒙古包），人口也就二百人左右。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废除了封建的寺庙经济和喇嘛们的各种特权，阿尔先沟的蒙族牧民才从封建的寺庙经济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因此，牧业生产不断发展，牧民们的生活状况也不断得到改善，文教卫生事业从无到有，改善了牧民们的医疗卫生条件，所以人口发展很快。现在阿尔先沟蒙族牧民人口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三倍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放宽了农村、牧区的经济政策，实行了放牧承包责任制，一九八五年，又把牲畜折价卖给牧民个人，牧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又进一步高涨，牧业生产又有了新的 发展。一九八〇年全乡牲畜存栏总头数为一万五千二百九十七头，而一九八五年则达到了二万零七百一十一头，五年内增加了五千四百一十四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三三。随着牧业生产的逐年发展，牧民们的经济收入也逐年增加。一九八〇年，人平均收入为一百三十四元；一九八三年，人平均收入为一百九十元。一九八五年，预计不会少于二百五十元。五年内人平均收入增加了一百一十六元，增长百分之八十六点五六。牧民们的经济收入增加了，物质和文化生活也不断得到改善。现在，他们不再为温饱而疲于奔命了，他们追求的是如何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玩得好一些。解放以前，蒙族牧民很少吃到面粉，大米更难见，也没有蔬菜。至于水果、糖、酒、（指工业酿制的烧酒、水果酒）羔点等也很少见到。如今则大不相同了，面粉国家按月定量供应，一个强劳力一个月可吃到三十八斤。解放以前吃不到的水果、糖、酒、羔点等，解放以后，也由国营商店或维吾尔族商人运来，每个蒙古包一年可吃到三十几公斤糖（砂糖和水果糖），二十几公斤水果。而烧酒则跃居他们日常生活消费中的第三位，仅次于吃的面粉和穿的衣服。一般说来，一个蒙古包一年至少要喝三十并烧酒，个别蒙古包一年要喝六十并。在衣饰方面，解放前贫苦牧民一般都穿羊皮衣裤，富裕一些的，也只能穿些家织粗布斜襟镶边花的袍子。解放以后他们就穿上了机织布，五、六十年代主要是穿条绒、棉卡叽；七十年代就穿的卡等高级衣料了，而现在都穿中长纤维织品了。男女青壮年都穿皮鞋。现在全乡有二十九家有毛料、呢子上衣，十二家有呢子

大衣。女青年的穿着更富有时代感，牛子裤、风雪衫也可见到。男女青壮年都戴手表。

巩乃斯乡蒙族牧民的居住条件也在不断地改善。解放前，蒙古包里的设置很简单。一进门，靠右手放着锅、碗、瓢、盆等日用炊具；靠左手则放马鞍子、马鞭子等放牧工具，正对门则是做饭、取暖用的炉子，再就是铺的毡子，盖的被子（有的家庭只有一床被子），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牧民们白天是席地而坐，晚上是卧地而眠。现在则不同了。现在的蒙古包里，一般都有木床，百分之二十的人家还有铁丝网床，个别蒙古包里还有沙发床。床头柜、五斗橱、八仙桌、折椅等已成为蒙古包里的日常摆设。其他现代化的高档电器用具也飞进了蒙古包。现在全乡有收音机六十五部，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录音机（包括收录两用机）三十一部，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一九；缝纫机七十一台，占全乡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二八。冬天，牧民们（主要是妇女、儿童）都住进木头房子，木头房子里有大立柜、写字台。不少蒙古包有存款，最多者千元以上。

这个乡的文教卫生事业也从无到有。现在这个乡有一所小学，一到五年级共五个班，一百零七名学生，三名教师，其中一位是民办教师，一位是代课教师。据乡政府领导讲，设想明年（一九八六年）这个学校要戴帽，增设初中班。全乡有一名人医和两名兽医，分别担负着全村的人、畜防疫和治病。

总之，这个乡自解放以来，同其他地区一样，在各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牧民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比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当然，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牧民们的愿望来说，这个乡本来应该取得更大的发展，然而由于我们党自一九五七年以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这个乡同全国其他农牧区一样，各方面面貌的变化还不是很理想。牧业生产仍然是传统的、陈旧的游牧方式，牧民们的文化水平仍然很低，全乡七岁以上的有四百七十五人，其中有一百七十四人是文盲，占全乡七岁以上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六三；小学文化程度的有二百二十九人，占全乡七岁以上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二二；初中五十九人，占全乡七岁以上人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四二。高中和中专十三人，占全乡七岁以上人数的百分之二点八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没有。全乡没有卫生院，遇有危重病人，或人扶或马驮，送到十几公里以外的巩乃斯林场医院治疗。这个乡仍然实行部落内婚制，无论男女，几乎没有与其他地方的蒙族人结婚的，并且多数是由父母包办的。

巩乃斯乡蒙族牧民宗教信仰的变化

巩乃斯乡蒙族牧民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由信仰萨满教而改宗为喇嘛教，到解放前已有四百年了。四百年来，喇嘛教的影响渗透到蒙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支配着蒙族人民的整个精神生活。多少年来，蒙族人民把“佛”看成是他们生活好坏、寿命长短、生财害病、子女多少、吉凶祸福的决定者，顶礼膜拜。他们以能去西藏熬茶礼佛，去塔尔寺、五台山朝圣为终生幸事，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他们认为喇嘛是“佛”的化身，倍加崇拜，不仅婚丧嫁娶、生疮害病要请喇嘛，就连决疑定计，也要咨询喇嘛，甚至受到喇嘛的抚摩、接手，也认为是

大福。然而现在，情况却有了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信佛的人逐步减少

解放以前，蒙族全民族信仰喇嘛教。巩乃斯乡的蒙族，无论大人小孩都是虔诚的喇嘛教信徒。那个时候，每逢喇嘛教的节日、新年春节，蒙族人全家，甚至刚生下来的婴儿也要由大人抱着到庙上去给“佛爷”磕头。这种现象现在也有。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我们去访问巴音库理雅时就见到大人小孩四五十人骑着马来到库理雅磕头，其中就有不满周岁的婴儿。我们问喇嘛们，这天是喇嘛教的什么节日，他们回答说，这天不是喇嘛教的什么节日，而是应牧民们的要求而举行的“念经会”。他们说：“一九八四年恢复库理雅以后一直没有举行过什么庙会，牧民们要求给他们念念经，所以就确定今天举行一次“念经会”。但是并不象解放前那样兴隆了。我们在巩乃斯乡就信不信佛这个问题，询问十五岁以上计三百三十二人，其中有五十人不信佛，占所问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点零六。这五十人当中有十八人是共产党员，二十人是共青团员，十二人是普通的男女牧民。中共中央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一文中指出，佛教（包括喇嘛教）在藏、蒙、傣等少数民族中几乎还是全民信仰的宗教，但是，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这完全符合巩乃斯乡宗教状况的实际。同解放初期相比，巩乃斯乡信佛的绝对人数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有所增加，但在全乡总人口中的比重却在逐步下降。认识到这一点是有意义的。

（二）怀疑佛存在的人越来越多

蒙族人民过去从不怀疑佛的存在，而现在则开始有人怀疑佛的存在了。我们在一百位中老年人中，就没有“佛”这个问题进行调查时，有八十一人说有佛，占被调查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一；七人说没有佛，占被调查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二人说“不知道”、“未见过”或说“可能有”，占被调查人数的百分之十二。这部分人，虽是少数，但他们对佛的存在已经发生了怀疑。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也不可能有的。

（三）佛在蒙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

前面谈到，解放前，阿尔先沟的蒙族人民把佛看成是他（她）们命运的主宰者，对佛非常崇拜，凡是有佛像的地方都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地，不敢有丝毫的怠和亵渎。现在不同了，相当一部分人不再认为佛是他们命运的主宰了，而只把它看成是慈善、如意、和平和幸福的象征。一位一生都信佛的、七十多岁的托吉老汉对我们说：“我从小就信佛。一直没有变，现在还信。我小时候信佛什么都不懂，只听父母说有佛，信佛保佑自己少病长寿，发财多子。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没有见过佛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还信。为什么还信呢？因为父母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信佛，为遵从父母遗训，使他（她）们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慰。另外，佛经上说佛不杀牲、不偷盗、不奸淫、不妄语等等，它象征着慈善、幸福、如意、和平。没有战争。”这 and 把佛看成是人们命运的主宰已经是天壤之别了。一位八十二岁的鲁日布洛翁（地位较高的喇嘛）直率地承认，“我们这个佛的威力不大了，不起什么作用了”。

（四）随着佛的地位的下降，喇嘛的威望也降低了

过去，蒙族人民把喇嘛看成是佛的化身，认为喇嘛无所不能，非常崇拜，大小事情，比如订婚娶亲、生疮害病、出门转场、死人出殡等都要请喇嘛决定或念经。然而现在就不一样了。在我们调查的一百一十四户人家中，订婚娶亲请喇嘛择定吉日 and 念经的只有三十户，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三二；死人出殡请喇嘛的有九十户，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八点九五。至于生疮害病，则只有五户既请喇嘛又请医生，只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四点三九，其余一百零九户都请医生而不请喇嘛，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点六一。现在蒙族牧民见到喇嘛不像过去那样望而生畏了。我们在阿尔先沟的日子里，经常看到库理雅附近的牧民自由出入库理雅，与喇嘛聊天。

（五）烧香拜佛的事也减少了

解放前，这里的蒙族，家家都供奉佛像，有香炉和油灯，有的蒙古包还有佛经。每天早、午、晚饭前饭后都要进香拜佛，而现在只有两家有佛像、香炉和油灯，其中一家还是刚从外地搬来的，但未看见他（她）们拜佛。其余各户的香炉和油灯都没有了。有八户既有佛像又有佛经，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七点〇二；只有佛像或只有佛经的有二十七户，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二八。佛像、佛经都没有的有七十九家，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七九。有佛像的也好，有佛经的也好，什么都没有的也好，一日三次烧香拜佛的事都不进行了，只有逢年过节，那些信佛的人才到庙上去进香拜佛。不过信佛的人也不都去。在我们调查的信佛的二百人中，只有一百五十人逢年过节到庙上进香拜佛，占我们调查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在二百二十名青少年中，只有十五人逢年过节随着父母到庙上去烧香磕头，而这多数又是出于听话，顺从父母或者去看热闹，并不真信佛。

（六）喇嘛们也不再重视佛教戒律了。

新疆喇嘛教为黄教。黄教喇嘛是吃肉的，不违反黄教教义和戒律。但喇嘛们绝不能吸烟、喝酒、娶妻。我们访问了四个喇嘛庙二十七位喇嘛，他们当中有十一人吸烟，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七三。遇有节庆喜日，喇嘛们一般都喝酒。昂嘉恩库理雅有一个满金④乌里扎，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庙里的其他喇嘛看见了也不管。解放以后有不少喇嘛陆续还俗结婚生子。现在又有不少结过婚的喇嘛回到庙里，庙里也只得承认他们仍然是喇嘛。喇嘛教的一些戒律在其宗教实践中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修改着。

（七）喇嘛庙里面面临着喇嘛后继无人。

解放前，按着喇嘛教黄教的规定，蒙族一家若有三个男孩，至少要把其中的一个男孩送到庙里当喇嘛，有的蒙族家里有三四个喇嘛。我们访问的鲁日布洛翁，他兄弟四人就有三人出家当了喇嘛。这些出家当喇嘛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并非都是出于自愿。有的是按喇嘛教的教规要求出家为僧的，有的是因有病还怨出家的，也有的是怕到牧主家当长工或给官家出壮丁而出家当喇嘛的。鲁日布洛翁兄弟三人为僧，除鲁日布

是按喇嘛教教规的要求出家为僧外，其他兄弟二人，就是由于父母怕儿子当长工，出壮丁而把他们送到庙里的。因为按喇嘛教的规定，喇嘛们享受着种种特权，比如喇嘛们不当兵、不纳税、不服劳役，而且吃得好，穿得好，还能学习，如果把藏文学好了，取得宗教学位就可以一级一级地晋升，享受荣华富贵。所以那个时候有许多人还是愿意到庙上去当喇嘛的，老喇嘛不愁没有继承人。如今再没有人愿意到庙上去当喇嘛了。现在庙里的喇嘛，最小的也五十多岁了，最大的已逾八十。这些老喇嘛担心他们圆寂后无人接班。党和政府根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允许他们接受愿意到庙里来的十八岁以上的青年为僧。尽管如此，至今很少有青年到庙里来为僧的。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只在巴音库理雅见到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到庙里出家当了“满金”。一位老喇嘛对我们说：“现在十八岁以上的青年，他可以信佛，但让他出家当喇嘛，不仅他自己不干，他们的家里人也不愿意。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我们一旦死了，庙里就无人了。”另外，老喇嘛们也不敢接收青年为僧，他们怕管不了这些青年人。一位老喇嘛这样说：“现在的青年人 not 比以前了，他们不听话，我们不仅管不了他们，恐怕他们还要管我们……。我们不敢收。”总之，喇嘛们的接班人问题已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实际问题。现在各级有关党政部门正在设法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所述的巩乃斯乡蒙族牧民们的宗教信仰上的变化，已经排除了十年动乱期间所造成的各种假象。“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毛泽东同志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丧心病狂地推行极左路线，封闭或拆除喇嘛教寺庙，焚烧佛经、佛像，砸毁法器，揪斗喇嘛，牧民们再不敢公开过宗教生活，进行宗教活动了，一时间显得冷冷清清。但是虔诚的喇嘛教信徒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是把他们的宗教感情隐藏起来。所以，一旦我们党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些虔诚的喇嘛教信徒就马上开始了公开的、正常的宗教活动。我们在前面介绍的巩乃斯乡蒙族牧民宗教信仰上的一些变化，不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

（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⑤。一九四九年，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倒了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社会经济制度的伟大变革，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不能不反映到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宗教领域。解放以前，巩乃斯乡蒙族牧民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是受苦人。解放以后，他们翻了身，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努力发展畜牧业生产，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尽管这种改善还不够显著，但是比起旧社会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不知好到哪里去了。鲁日布洛翁就说：“我是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人，那时候穷人太多了，没有自由；现在穷人没有了，大家都一样，讲平等。”

“我从实际上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新旧社会制度和两种生活的对比，使不少牧民觉得喇嘛教所说的是虚无飘渺、不可捉摸，而共产党所说的却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从而产生了与传统信仰决裂的契机，放弃了宗教信仰。不仅一些牧民们如此，就连一些喇嘛也由于新旧社会的不同经历，从而对喇嘛教发生了怀疑，产生了动摇。一位解放前当过满金的伊西老汉说：“佛这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到底有没有佛？……学习了十多年的佛，也未搞清楚……。但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爸爸、妈妈都信，我们这些

做儿女的也不得不信。”这些变化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的增加，牧民们亲眼看到了医疗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这方面，巩乃斯乡的牧民们几乎是百分之百地相信医疗科学，而不相信喇嘛了。有少数牧民则根本就不相信喇嘛教了。据我们调查，这个乡的妇女，无论是解放前或者是解放后，生育率都是比较高的，而且解放前比解放后还高。解放前，平均一个妇女生七个孩子，解放后则为六点二六个孩子。成活率怎么样呢？解放前成活率还不到百分之五十，而解放后成活率则为百分之六十九点八五。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六年这五年间，成活率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一·二五。这一新的社会现实教育着广大牧民，引起了他们当中一部分人主观世界的变化，其中包括宗教信仰的变化。这个乡的乌拉斯泰村有一位叫阿拉的牧民，今年六十三岁，他父母只有他这么一个男孩，因此倍受父母宠爱，很早就成了家。他们夫妇一生共生了十七个孩子，最后只活了七个，解放前生的都死掉了。阿拉说：“小时候父母就领我参加宗教活动……父母亲去世以后，为了继承父亲生前的传统，我还坚持参加宗教活动。”“结婚成家时还求过佛爷的保佑。一生共生过十七个子女，一多半都不幸死掉了，幸存的七个，也都是解放后生的。因此，我就想，天天求佛爷保佑，可结果什么保佑也没得到，不幸的事情照样发生。想到这些，心里不免对佛也不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了。”

“解放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医疗卫生和生活条件都好了，幸存的几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现在又都成了家，而且大都有了孩子。他们都很孝顺我，生活上尽量照顾我，安顿好我的晚年。我很满意。……这些都要感谢共产党和政府的关怀。不然，我这个苦水里泡大的穷苦孩子是绝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的。”“现在，自己的下一代都不大信佛了，也很少拜佛，我也不强求他们。何况我自己由于多年来生活经历和切身体会，也不大信佛了。”生活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喇嘛教越是宣扬佛爷的神通广大，能保佑人们的幸福，而实际上又不是那么回事，这样，久而久之，人们自然会失去对佛爷的信任。

（三）、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牧民们进行抗灾自救斗争，使牧民们认识到自然灾害是自然造成的，人们能够战胜它。解放以后，这个乡所在的巴音布鲁克区曾遇到几次比较大的雪灾。这要是解放前，那一定是人死畜亡，一片凄凉、萧条景象。可解放后的情形就不一样了。每逢这里遭到自然灾害，党和政府马上就派出大批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带着抗灾救灾物资前往灾区进行慰问，并组织受灾人民进行抗灾生产自救，从而保住人、畜的安全。一九八四年冬，巴音布鲁克区又发生特大雪灾，和静县委和政府派出民政局副局长和其他干部立即带着救灾抗灾物资驱车赶到这里，与牧民们一起进行抗灾斗争。与此同时，当地驻军也派出汽车部队满载着面粉、罐头和其他物资来到这里进行救济慰问，保证了牧民和牲畜安全过冬，人畜两旺，充满着生机。这种受灾而无灾的景象，若在旧社会，牧民们是不敢想的。这些新的社会实践提高了一些牧民的认识，看到了人的力量，驱走了自己头脑中的迷雾。我们就自然灾害是怎样造成的，人们能不能战胜自然灾害的问题，对一百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说是自然形成的，百分之六十的人说是老天爷（“佛”）造成的；百分之六十八的人说人是能够战胜自然灾害的，百分之十七的人说人不能抗御自然灾害只能听天由命；有百分之十二的人说不知道。这些数字说明，宗教信仰者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们在实践中也会改变自己的思想的。我们就自然灾害是怎样造成的，人能不能战胜自然灾害的问题跟一些牧民座谈时，一位年近五十的普通牧民妇女竟能说出“自然灾害是自然形成的，人可以战胜自然灾害，我们土尔扈特蒙古就是跟自然灾害作斗争过来的”。我们听了之后都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四）科学技术的渗入。这个乡位于天山深处，虽然靠近库尔勒到伊宁和库车到独山子的公路，但和山外比较起来，这里毕竟还是偏僻的，闭塞的。尽管这样，科学技术的曙光还是照进了这个山沟沟。前面提到这个乡至今还没有电影放映队，区上、县上的电影放映队来得也很少，但总还是来演出过。另外，临近的巩乃斯林场则经常放映电影，近几年还放映录像，巩乃斯乡的牧民们就可时常来这里看电影，看录像。近十多年来，这个乡的不少牧民家购置了收音机、收录两用机等高档家用电器，经常可以听到科学技术方面的广播。所有这些不能不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牧民们的思想，使他们当中部分人的宗教信仰发生变化，由信仰宗教到不信仰宗教。

（五）无产阶级世界观（无神论）的宣传、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知识的普及教育，也在帮助牧民们克服着宗教迷信的偏见。诚然，解放以来，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无神论）宣传的时候，存在着方法简单、态度生硬的现象，特别是后来林彪、“四人帮”妄图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强迫人们放弃宗教，确实伤害了一部分信教群众的感情。但是，必须看到解放以来，特别是解放初期，我们党结合土地改革、牧业改革、合作化运动，组织农牧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各族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知识的教育，对于一些牧民摆脱宗教思想枷锁，扔掉手中的佛珠，去争取今生的切切实实的幸福，无疑也是起了作用的。

解放以来，巩乃斯乡蒙族牧民的宗教信仰状况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真正争脱了喇嘛教思想束缚，抛弃了宗教信仰的还是少数，在十五岁以上的三百三十二人中只有五十人不信佛，仅占十五岁以上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点零六，而二百八十二人还程度不同的信佛，占百分之八十四点九四。这就说明，在我国虽然消灭了剥削制度，宗教存在的国内阶级根源已基本消失。但是还必须看到，“由于人们意识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消除；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以及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还需要长久的奋斗过程；由于某些严重的天灾人祸所带来的种种困苦，还不能在短期内彻底摆脱；由于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因而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一部分人中的影响，也就不可能避免地还会长期存在。”^⑥我们所调查的巩乃斯乡蒙族牧民虽然已有一些人不信喇嘛教了，但所占比例很小，基本上还是处于全民信仰喇嘛教的状况。所以，对待宗教问题，我们还必须坚持特别慎重的态度，坚决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和静县落实宗教政策的一般情况

我们结束了巩乃斯乡宗教社会学调查之后，在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又到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巴音郭楞乡、巴音乌鲁乡、巴轮台区黄庙、北哈拉莫敦乡（原先行公社）、南哈拉莫敦乡（原上游公社），对这些区、乡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宗教活动情

况进行了一般了解。总的说来，当地蒙族农牧民和喇嘛们对和静县各级党政部门落实宗教政策，特别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巴音郭楞乡、巴音乌鲁乡各开放一个库理雅（见《资料集》二、3—4）。巴仑台黄庙原被新疆军区后勤部第十四医院占用，一九八四年，第十四医院让出主庙即黄庙，并补偿二十万元。一九八五年九月修葺一新，正式开放。南北两个哈拉莫敦乡原有五个库理雅，现在一个也未恢复，蒙族群众和喇嘛们需要进香拜佛或遇有喇嘛教节日时，则要到巴仑台黄庙，来回几十公里，乘拖拉机或汽车，浪费人力物力，蒙族群众希望在两个乡开放一个库理雅。县委统战部说，他们早已看到这个问题，但中央有文件，说第一次宗教改革时废除的寺庙一般不再恢复。这个问题县里不好解决，需自治区有关部门出面研究才能解决。第二次宗教改革时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收的喇嘛们的自留畜和其他寺庙财产已归还或正在归还中。

在这次调查中，和静县委特派民政局副局长乌鲁木加甫同志参加了我们的调查工作。我们自始至终得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党委统战部、政府民委、州接待处、和静县委统战部、政府民委、巴音布鲁克区、巩乃斯乡的党政领导和巩乃斯乡的全体牧民的大力支持。接待处小车司机包来同志参加了我们最后阶段的调查工作。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调查工作结束后，我们就着手对调查资料按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分类、制表、文字整理等工作，现在编印成《巩乃斯乡调查资料集》。这个《调查资料集》共分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加了按语。这三个部分是：第一部分是个案访问笔录，第二部分是专题材料，第三部分是各种数字统计资料。

对我们来说，对一个民族进行宗教社会学调查还是第一次，特别是我们这些参加此项调查的人又都缺少社会学的基本知识，时间又很短，本来有些应该调查的项目未能进行，已经调查的也不够深入、细致。因此错误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从事民族、宗教工作的同志和治民族学、宗教学等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们提出批评指正

注释：

① 昂嘉恩库理雅：“昂嘉恩”为藏语，是一喇嘛的称号，原来意思不详。有的译为“昂嘉京”、“昂嘉腾”、“安加”等，我们这里译为“昂嘉恩”。“库理雅”是蒙语，原意是指聚集在一起的蒙古包，这里指的是由一群蒙古包组成的喇嘛庙。有的译为“库伦”、“库勒”，我们这里译为“库理雅”。

② “南部”也可称为“南路”。土尔扈特蒙古族从额济勒河迁回祖国以后，清朝政府把渥巴锡直接管辖的一支安置在天山以南的焉耆所辖的大小祖勒都斯放牧，称为南部或者南路土尔扈特。其他分别安置在今塔城和布克赛尔地区，称为北路土尔扈特，安置在今乌苏县境内的叫东路土尔扈特，安置在今精河县境内的叫西路土尔扈特。另外，与渥巴锡同时归来的舍棱一支安置在今阿勒泰境内，叫新土尔扈特。

③ 鄂托克是土尔扈特蒙古族在额济勒河时的社会组织单位。迁回新疆以后，清朝政府在土尔扈特蒙古族中设立了盟旗制度。其中“旗”就相当于“鄂托克”，和静县蒙族也把“旗”叫做“和雄”或者“和硕”。

④ 《报告》中出现的“洛翁”、“格林”、“葛斯勒”、“满金”等名词，是不同地位的喇嘛教僧人的称号。“洛翁”是指具有丰富的佛教知识、地位较高的喇嘛。

在一个寺庙中，一般帮助大喇嘛主持庙务；“格林”是地位低于“洛翁”的喇嘛，在一个寺庙里一般为经文教员，或管理庙产、佛经、佛像、法器等；“葛斯勒”是学习经文的高年级的学生；“满金”是学习经文的低年级的学生。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四〇页。

⑥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一）

唐世民、才吾加甫、刘景周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

二 个 案 访 问 笔 录

下面是我们访问九个各方面人士的谈话笔录。这九个人当中，有乡一级的领导干部，也有普通的男女牧民；有年逾花甲的老人，也有十八、九岁的青年；有一直坚持宗教信仰的虔诚的喇嘛教徒，也有过去信佛，现在不信佛的人士；有学校的教员，也有宗教职业者。从他（她）们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她）们的不同经历、不同的文化修养、不同的想法和要求。那些过去信佛，后来在自己的实践中体会到佛爷并没有给他（她）们带来什么好处，从而认清了宗教说教的荒谬，转而相信自身的力量的人们；那些祖祖辈辈信佛，但那一辈都没有见到佛爷到底是什么样子，从而现在开始怀疑佛爷是否真正存在的晚辈们，更为从事宗教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我们愿意和这些同志们一道为研究这些新课题而努力。

访问乌尼尔才其克笔录

时间：一九八五年九月五日下午一点五十分

地点：阿尔先村会计办公室

访问人：乌鲁木加甫（兼翻译）、唐世民

访问对象：乌尼尔才其克，女，二十岁，蒙古族，巩乃斯乡阿尔先村牧民，高中一年肄业。

记录并整理：唐世民、刘景周

乌尼尔才其克说，我今年八月份结婚，公公已去世，婆婆还健在。我结婚后与婆婆分开过。

乌尼尔才其克说，我们家祖祖辈辈放牧。我小时候，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很喜欢我，他（她）们都希望我长大后能找个工作（指国家职工），我懂事以后也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找个工作。

乌尼尔才其克说，小时候父母领没领我到庙上去过，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两年前，我的父母亲领着我到昂嘉恩库理雅去磕头。父母亲对我讲，咱们家过去祖祖辈辈都要去庙上磕头，你现在长大了，也应当去。上庙那天，带着酥油、奶疙瘩、毛巾（代替哈达）和钱。到了庙上，点了酥油灯，磕了头，心想求得佛爷的保佑。乌尼尔才其克说：“打这一次起，我就开始单独去庙上。老年人讲，我们家世代拜佛，日

子过得不错，现在我长大了，应该遵循老一辈的习惯，求佛爷保佑，过一辈子安稳日子，不要碰到意外。外人没有劝过我信佛，我也没有学过佛经，听大人们讲，不出家，是不学佛经的。我记事的时候，喇嘛庙就没有了，也没有人再到庙上去出家了。我只看过做过喇嘛的伯父念过经，也不明白他念的是什么意思。我上的是国家办的学校，课本都是政府规定的。老师常给我们讲，你们是党的后代，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为人民做些工作。可现在想，上了高中也是白搭，学的东西没地方用。”在问到她想从事何种工作时，她思索了一会儿说道：“想当医生，但没有基础，不过当干部的想法有呢。”乌尼尔才其克认为佛是有的，一心一意信佛。她说：“有人说没有佛，磕头没用，这是胡说。”

乌尼尔才其克从小爱唱爱跳，性格活泼，在谈到自己的婚事时，她说：“我的事情是父母亲包办的，婚前自己也不曾考虑过该找个什么样的对象，也没有请过喇嘛，求佛爷保佑自己找个好对象，就等待父母说呢。既然父母亲同意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丈夫和我同村，婚前也互相认识，还时常在路上碰见，但不曾说过话。听别人讲，这个人不错，自己心里也算踏实了些。结婚前曾找过喇嘛择定吉日，结婚当天没请喇嘛念经”。在谈到他们俩人的感情时，她羞羞搭搭地说：“既然已经结了婚，不爱又怎么办呢？反正我们没有吵过架”。

乌尼尔才其克的小家庭现有一台录音机，设想明年除了盖木头房子，还要置办缝纫机、立柜、八仙桌、写字台、床头柜，把现在的录音机送给弟弟，自己再买个新的。

最后，乌尼尔才其克还谈了自己的意见和希望，她说：“念了八、九年的书又回到了家里闲呆着，一天到晚看蒙古包，煮奶茶，真后悔当初不该念书。现在有靠山的，能走后门的，路都打通了，而我们这些没有门路的，写了几次信都没有回音。有几个连小学都没念到毕业的，却送去学兽医了，剩下我们这些有初中文凭，还念了一年高中，却没有人过问。所以，我最大的希望是政府能给自己安排个工作，使学过的一点知识能派上用场。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

访问包来笔录

时间：一九八五年九月五日下午六点

地点：阿尔先村会计办公室

访问人：乌鲁木加甫（兼翻译）、唐世民

访问对象：包来，女，十八岁，阿尔先村牧民（我们到阿尔先村后，乡政府派她给我们做饭，是一个天真、纯朴的姑娘）。

记录并整理：唐世民、刘景周

唐世民：你给我们做了二十多天饭，辛苦了。我们感谢你。今天我和乌鲁木加甫局长没有出去，离做饭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想和你谈谈，可以吗？

包来：可以。

唐：有顾虑吗？

包：没有。

唐：我们问到的一些问题，你们年轻姑娘可能不好意思说，我们希望你不要有顾虑，不好意思，一定要大胆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包：可以，你们问到的，我能够回答的，一定回答。

包来说，我的父亲去年得胸肺病去世。我母亲是六三年与我父亲结婚的，一共生育了10个孩子，存活的只有5个，我排行第二。姐姐已出嫁，下面还有三个弟弟，我们家生活比较困难。我父亲与我母亲结婚前曾结过一次婚，一九六三年父亲的前妻病逝了，扔下一个男孩，先跟我们一起过，后来送给别人了。我虽排行第二，但因是最小的一个丫头，父母亲都很喜欢我，特别是我的父亲更喜欢我，让我念书。

包来谈到，她跟随大人先后三次去库理雅（喇嘛庙）。第一次大约在她13岁时，后两次是在她父亲去世后，由母亲带领去的，其中有一次是给昂嘉恩库理雅缝蒙古包。她的父母亲时常给她讲，喇嘛教是他们家祖祖辈辈都信奉的，也正因为给菩萨磕了头才保佑了他们这五个孩子安全成长。去庙上烧香磕头就是为了他们这些孩子长命百岁，不要遇到什么意外。对这些她是相信的。去年，她还单独去过庙上。她回忆到：“当时昂嘉恩库理雅的喇嘛在山外死了，人们把他的尸体拉到高峰（巩乃斯林场场部附近），大家都去了，所以我也去了。因为昂嘉恩喇嘛生前在我们这个山沟住了一年，我给他做了一年的饭，有些感情。‘枪近打得准，佛远给保佑’。昂嘉恩喇嘛岁数大，我希望佛爷能把他的岁数给我。老年人说，人死了，要给他念经，不要让他入地狱，要让他升天。对这些，直到现在我还是相信的。至于佛爷为什么没有保佑我的父亲，心里也想过，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包来小时候爱唱爱跳，还特别爱听老年人讲旧社会的一些故事。在谈到她的希望和要求时，她说：“我最想上学，但家里有困难，又有什么办法呢。再说自己的年纪也大了，也不好意思了。十七、八岁的丫头还上学，人家说呢。想找个工作挣工资，为此还找过乡政府，但是，文化太低，不可能。大弟弟已经十六了，小学也未念完，也不行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两个小弟弟培养成人，让他们上好学，将来有所出息，我做姐姐的也就感到欣慰和满足了”。

最后，包来谈了对自己终身大事的想法。她说：“也想过结婚，年纪大了，懂事了，不想也不可能。但现在不想出嫁，也不可能出嫁。因为家里困难，姐姐已经出嫁了，妈妈有病，弟弟们还都小，爸爸生前看病，借了不少钱。我想父亲去世了，现在我当家庭的主人了，应该保护好妈妈的身体，把弟弟培养成人。一想到这些就不能早结婚了。我要在家里帮助弟弟把账还清，然后再结婚。”在谈到她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丈夫时，她说：“最好是人老实的，不喝酒，知道人家困难的，体贴人的。碰到这样的人就差不多了吧。谁知道将来碰上什么样的人。为此，我暗中求过佛爷的保佑，佛爷或许能保佑自己找一个好对象。”

访问苏来笔录

时间：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下午

地点：阿尔先村会计办公室

访问人：乌鲁木齐甫（兼翻译）、唐世民

访问对象：苏来，女，三十七岁，阿尔先村牧民

记录并整理：唐世民、刘景周

苏来说：“我三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我是在继母的培养下长大的。我十五岁时，父亲又离开了我们。我父亲很喜欢我。因此，父亲临死时跟继母说：‘我死以后不能把苏来送往别人家去，她要结婚时，也要把男的娶到自己家来’。但父亲死后，继母就变了，未能照父亲的遗嘱去做，她虐待我。她自己生了九个子女，吃饭时，先让她亲生的孩子吃，然后才让我吃。穿的是大布（粗棉线布）长袍，又是衣服又是被子，满衣服上都是虱子。我十六岁时，继母自己把一个男人接到家里来，我继续在这个家中生活。我十七岁时，继母给我找一个二婚的，我同意了。因为，我想自己被虐待得太厉害了，离开这个家算了。我碰上什么人，就算什么人吧，死不了就行。十八岁要结婚时，继母的弟弟不同意，他说：‘她父亲死时有话，要找一个未结婚的，并且要接到家里来，现在怎么要嫁出去呢？’这样又拖了一年，最后还是把我嫁给了这个男人。结婚后当了十二年媳妇，我也未生育。二十几岁时，我想男的要孩子，我又不能生，就提出离婚，但男方不同意，他说我能生育，可是十二年过去了，我也未生育，感情不好了，男方要离婚，这时我已三十岁了，不想离也没办法，最后还是离了。后来我又结了婚，是自己找的，没让人包办。我这个爱人比我小六岁，他跟我结婚前结过一次婚，后来妻子死了，我就跟他结了婚。他前妻扔下一个女孩，领过来过了两年。”

在谈到宗教信仰和参加宗教活动时，苏来说：“父亲在世时领我去过庙上。但那时小，什么也不懂。父亲逝世后一直没有去庙上，别人也没有让我到庙上去拜佛。我不相信佛，相信佛有什么用？父亲死时跟继母说过，不要把我嫁到别人家去，要把男的娶到家里来，继母在父亲面前说得好好的。但父亲死后，她就没按父亲的话去做。她自己请一个男人过来共同虐待我。我结婚后，又不生育。起初，我还不相信自己不生育，但离婚后，男方又找一个，生了小孩，而自己也找一个，结婚以后，我还不生，这就不是男方的问题了，是自己不能生育。父亲是信佛的，但佛给他什么了？给我什么了？每个人都是一次生，一次死，但人家都能生育，而我不能生育。父亲死后留下我一个人，现在既不成一个人，又不成两个人，自己有包袱，痛苦呀！”

苏来说：“我一直都没有想到过去求佛。人一生总要遇到好多问题，拜佛能有什么结果。我自己不能生育，佛能给我什么？我不认识佛。所以人家都去庙上磕头，我不去。”

在谈到她对今后的生活前途有些什么想法时，她说：“现在我后悔就是没有去大医院检查。当时也不知道。后来听人家说，大医院可以检查，不生育还可以治。现在知道也晚了。我今年已经三十七岁了，我现在把姐姐的一个女儿叫过来了，把她培养大，将来老了，跟孩子过。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要得病，不要麻烦丫头。如若有病，快快死，不麻烦丫头就行了。”

编者按：苏来自懂事起遇到许多不幸，为什么遇到这么多不幸，她不能解释，对生活消极、悲观，我们对她给予了鼓励。指出她还年轻，应该检查身体，治病，振作起精神来。

访问布杰笔录

时间：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晚八时

地点：阿尔先村会计办公室

访问人：乌鲁木齐甫（兼翻译）、唐世民

访问对象：布杰，女三十九岁，阿尔先村牧民。

记录并整理：唐世民、刘景周

布杰说：父亲叫木里戴，母亲叫欧吐该。母亲生我们兄弟七人，现在仅剩下两人了。爸爸、妈妈都很喜欢我。不过，因为我是女孩，没有提到希望我长大后做什么。我只念了一年书，因为母亲病重，所以就不上学了。我小时候爱唱爱跳的，现在什么兴趣都没有了。

布杰谈到宗教信仰时说：我小时候没有跟爸爸、妈妈到庙上去过，我父母都不大到庙上去，我现在什么信仰都没有。

我结婚是父母包办的，除父母的话，我谁的都不听。结婚登记时，登记的人问我愿意不愿意与我爱人结婚，当时我羞得什么话都没有说。我爱人原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还当过公社主任、公社书记，他是不信佛的，我也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不信佛。我爱人有一年去套马摔伤了，治了一年多，没有治好，死了。我爱人去世以后，组织上很照顾我，干部们也很同情我，给我救济了被子、毡子，亲戚也帮忙。去年以前，每年都给补助一百个工。现在大儿子已经十七岁了，初中毕业，去年给安排了个固定工，一个月七十元工资。我们还买了一百一十只羊，四匹马，七头牛。多了不敢要，多了，遇到灾害就不好办了。所以没有要那么多。现在干部们对我看法都很好。

在谈她对今后的生活有什么希望时，她说：“爱人去世以后，扔下六、七个孩子，再想找人也不大好找，所以现在就是一心一意把子女培养好，孩子和自己都不得病。过两年再给大儿子娶个媳妇，这就是我的希望”。

在问到她知道不知道“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时，她说：“从广播里听说过，干部们也讲过，但理解不透，不太懂。大概是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生产给国家，差不多吧。”

访问鲁日布洛翁笔录

时间：一九八五年九月八日上午

地点：鲁日布洛翁家

访问人：乌鲁木齐甫（兼翻译）、唐世民、才吾加甫、刘景周

访问对象：鲁日布洛翁

记录并整理：唐世民、刘景周

唐：我们来到你家已经一天多了，受到你和你的全家的热情招待。一天多来，你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情况，使我们大开眼界，受益不浅。我代表乌鲁木齐甫局长和我们这个调查组，向你和你的全家表示感谢。祝你健康长寿。祝你们全家万事如意，身体